

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徐秦法 张 肖

(广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 要: 因彰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功能的内在需要, 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内蕴着对意识形态话语范式实然形态的历史性超越与发展性建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 遵循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回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何以必要、何以可能, 探寻促进新时代话语体系发展变革的动因与内生机制, 以期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政治话语的学术性表达, 促进理论话语的实践性转向, 彰显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世界性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主流意识形态; 话语体系建设

中图分类号: A81 D2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431(2022)01-0159-08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 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与实践引领力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筑牢了思想根基与精神动力。意识形态话语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 话语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语境下自我完善的客观要求, 是在坚持“话语形式之变”始终为“意识形态内容”服务这一宗旨前提下的创新发展。其核心要义就在于以意识形态“关键词”之转换为标志, 生成话语系统的自我更新与自我替换, 以更具有指向性和表征性的话语阐释, 凸显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性、现实性与主题性。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三重逻辑统一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它根植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生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碰撞所激发的理论革新, 内化于中国社会变革的逻辑使然。在中国, 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主题, 衍生出更深层的社会矛盾又昭示着更重大的使命担当, 由此决定着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阐释也会有相应的变革, 进而引发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革故鼎新。如是, 从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演进逻辑着力, 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层维度相统一的视角透析, 探寻在中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何以必要、何以

可能。

(一) 立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生成发展轨迹, 呈现其历史逻辑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2} 20世纪初期, 中国正值列强入侵、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 在历经了无数救亡图存、谋求复兴的艰苦探索之后, 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获得党和人民的普遍认同, 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理论, 是对时代呼声的应答, 它满足了当时社会现实的发展需要, 为无数革命先贤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指明了前进道路。马克思主义源于欧洲, 它通过透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行的特殊规律, 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 在内容体系、概念阐发、逻辑范畴等多个方面都含有鲜明的西方话语表达色彩。也正是由于具有世界普遍性和民族差异性的双重理论属性, 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地域间的应用与传播必须融合具体的民族形式, 在保持核心话语本质和终极价值诉求的基础上, 实现话语体系的建设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坚持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实现了由“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西方革命话语向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设转向。作为探讨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革命思想,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性规定, 核心问题域是以阶级斗争为理论中轴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如恩格斯曾明确

* 收稿日期: 2021-06-30

作者简介: 徐秦法(1971—), 男, 黑龙江哈尔滨人,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肖(1987—), 女, 辽宁锦州人,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指出“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2]523}如果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引介属于自发状态,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进入了自觉状态。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破除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将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转换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理论武器,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不断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集中阐释一条不同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却与中国革命实际相匹配的方针、策略、路线,以期牢固确立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自主支配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聚焦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向“社会主义革命”话语的建设转向。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又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贯穿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建设实际紧密结合,提出了有别于苏联以“革命建国创业”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话语,按照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差别“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3]588},将意识形态话语转为关于“生产”的科学,探索性地提出一条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第二个阶段,贯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出现重大失误,包括意识形态批判中的“左”倾错误明显、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等,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泛化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主导地位,但也造成了思想领域的混乱,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紧跟时代主题的发展变化,实现由“社会主义革命”话语向“社会主义建设”话语的基本转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极左意识形态进行全面清理,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拨乱反正”。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进入“自发建构”阶段,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现代话语体系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逻辑”,集中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本路线和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框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综合党情、国情、世情的新变化,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时代课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从革命党意识形态向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关键性转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改革开放的正当性问题及思想领

域中“左”、右两种思潮作出明确回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进入“自发调适”阶段。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时代课题,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理论话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由“生产型”向“和谐型”的过渡转换。

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导向,逐步转向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有效性证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将意识形态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他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4]153},并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来,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根本遵循。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时代课题,形成了以“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治理新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关键词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相结合,逐步实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向证成“中国道路的合法性”维度的转向。

(二) 阐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何以必要,厘清其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科学阐释了人类社会崇高的价值追求,深刻揭示了自然、社会与人类思维客观发展的基本规律,它作为推进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与灵魂,为彰显以中国价值观念为核心的理论表达,为构建具有国际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封闭僵化的教条,它作为人类思想史的伟大变革,是视野宏阔、思想深邃并不断丰富发展着的科学体系。因而,以理论支撑为依托的意识形态阐释话语也势必要遵从理论嬗变的内在逻辑,将不同时代背景下话语体系建设作为意识形态发展的应然诉求。

一是不断加强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内在性规定。创新是理论常青的内生动力,马克思主义作为不断发展着的开放型理论,在实践中坚持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与外延是其永葆生命活力的根源所在。意识形态话语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承载与显现,必然遵循理论嬗变的内在逻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两次理论飞跃恰恰成就了意识形态话语发展的重要契机,这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内在性规定,更加彰显了其时代化发展具体化结合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起源于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我党的领导地位,纠正了博古、王明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534}自此,中国人民正式

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担负着如何解救民族危亡、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自然没有现成答案可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革命实践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第一次飞跃需要意识形态话语的承载与显现,通过对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革命理论的集中阐释,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精神实质,引导中国革命道路取得胜利,解决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产生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目标,党领导人民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形态形成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主题化集成这一理论属性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理论飞跃成就了意识形态话语变革的现实场域,以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视阈推进中国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新自觉,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内在性规定,又是以中国实践为依托的理论表达的现实性需求。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思想竞争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外在性动力。马克思主义从诞生时起就不断遭受资产阶级形形色色“主义”、流派的攻击和诋毁,在同各种“非马”“反马”思潮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6]13}同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甚至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竞争,从本质上看,竞争的根本性目的是为了获得理论在实践维度的合理性证成,以此来增强自身意识形态的公共解释力。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多元化社会思潮之间的竞争交流也恰恰成就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嬗变之最佳契机。

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经历的最为曲折的发展阶段就是“文革”时期。由于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的基本形势,主观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导致我们党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并逐渐扩大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同时,由于受理想主义、急躁冒进等情绪影响,党的主要领导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导致极左的教条主义被推向历史巅峰,此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话语也被进一步极端化了。伴随着党内“左”倾错误思潮的蔓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迎来了新的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拨乱反正”的话语范式真正开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及时转换纠偏,对极左的教条主义思潮进行了全面清理,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先后出现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政治立场。在与各种极左、极右的思想立场进行交流交锋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实现了“新”“旧”转换,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现代化建设话语应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进攻,提出“坚持理论创新”以加强党的建设话语应对与老教条、洋教条的斗争,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和谐社会建设话语应对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政治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互结合作为实践标准,再以实践维度照拂意识形态理论话语之嬗变逻辑。

进入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面临的冲击主要集中在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形成的以物为本的价值取向,诸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同时,在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西方多元化价值理念、思维方式源源不断地输入我国,由于中国崛起的模式跳脱了西方原有的“西强东弱”的既定框架,导致西方国家对我国模式带有偏见性乃至歪曲解读,“大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政治不确定论”等歪曲论调不绝于耳。由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应着眼于“中国方案”的世界性表达,以不断加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有效应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理论“失语”现象,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合法性的话语”供给。

(三) 追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何以可能,彰显其实践逻辑

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7]3}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它从来不是书斋学问,而是一切行动的基本指南。它之所以可以历久弥新,真理价值永存,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为人们提供了改造世界的实践武器。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接续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也必然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提供现实保障。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和人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8]213}意识形态虽然作为一种理论的抽象,作为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但其内容始终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映射。它根植于社会的经济基础,为物质生产条件所决定,并始终将社会实践的发展作为自身话语变革的根本立足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党领导人民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解放思想和探索实践的双重战线上拨乱反正,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成功转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又制定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转向,通过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国人民开始富了起来。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综合党

情、国情、世情的新变化,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从“发展就是硬道理”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向,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21世纪不断推进,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富了起来。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求真务实,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矛盾,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开展“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针政策,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走向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新矛盾、新挑战,提出“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从“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从“精准扶贫”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次次重要的实践探索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了历史高峰,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奠定了现实基础,也从实践维度彰显了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增强了我国意识形态话语变革的合理性和说服力。新时代意识形态的话语建设也必然根植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变革,不断从实践中汲取内生动力,并以服务实践作为话语体系建设之根本旨趣。

二、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动因与现实旨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意识形态话语之“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自然不会凭空产生,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这种可以促发话语创新的动力,总的说来就是既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所要表征、传达的时代新主题之间的矛盾。具体地说,就是既有的话语体系不能充分含摄、传达新的时代主题之需要,显示出其陈旧、简单与不符,导致“旧的”话语体系效果极大弱化,从而促成话语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可以看到,存在于话语体系本身与时代发展需要之间的诸多矛盾力量是促成当代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根本原因。故而,在新时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探讨引发话语变革的矛盾因素,是解决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为什么需要建设”的关键所在。

(一) 解构意识形态话语定型与中国道路实践转型之间的矛盾张力

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比作一套“持续和统一的信条”^{[9]78},从意识形态的演进逻辑进行审视,由于意识形态集中表达了特定社会阶级和利益集团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两者在根本价值取向上的历史一致性,以至于在意识形态的话语辩护方式和理论基础方面也具有坚定性,使得意识形态被赋予了稳定性的历史特征,而意识形态这种与生俱来的政治稳定性又通常外化为意识形态话语范式的一种定型。尽管以话语定型来保持意识形态的稳定性是维系其自身合法性的内在要求,却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意

识形态的发展变迁提供了掣肘。

再观中国道路的实践发展贯穿于中国42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长足进步,实际上在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以前,中国人民已经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沿着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开启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河,为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在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标志着中国道路的全面探索阶段正式开启。鉴于实践本身所具有的开放属性,决定着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绝不会一成不变,实践转型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依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提出为中国道路的探索带来全新的转向,即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转型;伴随着“三步走”战略的逐步推进,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作出了新判断,提出了政治文明改革创新的时代目标,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使得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深入发展;在全面反思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社会带来的弊端后,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的实践发展又一次迎来重要转向,实现了由“发展就是硬道理”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背景,引航定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目标。统筹规划,谋篇布局,提出推进“五位一体”整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领域全方位推进中国道路的实践转型,逐步实现由“道路探索”向“道路自信”的时代性转向。

可以看出,中国道路自形成伊始就以自身的转型变革作为内生动力不断发展前进,构建与中国道路的实践维度相匹配的话语表达正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存在旨趣,由于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稳定性,决定了意识形态的话语定型与中国道路的实践转型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张力,而这一张力也正是催生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外在动力。进入新时代以来,伴随着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逐步深入,中国方案的理论表达与现实之间呈现出一种错位,即由于话语表达未能充分立足社会实践使得中国道路发展的合法性受到争议。通俗来讲,就是“做的不错,说的不够”,导致有的国人信奉西方理论,甚至将中国的发展成就归结为资本的作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视而不见。纠其根源,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未能实现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匹配的发展转向,未能将实践中的中国道路升华为理论中的中国模式,从而引发了话语权弱化的问题。由此也更为确认了有效解构存在于意识形态话语定型与实践转型之间的矛盾张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合法性的话语”供给,构成了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之

根本原因。

(二) 平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表达与意识形态大众化阐释之间的矛盾张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全面阐释,符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生成发展逻辑,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呈现。作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凭借自身理论化的鲜明特征肩负着塑造主导性价值共识的使命要求。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全面渗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政治立场、政策主张及理论观点,以期最大程度地凝聚社会思想共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合法性的话语供给。

所谓意识形态的大众化阐释是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民众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学理性话语进行阐述表达,以此获得大众认同并愿意主动践行,按照马克思的话语就是“理论掌握群众”。列宁也曾说过“最大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大限度的通俗化和简单明了。”^{[10]467-468}话语作为人类交往行为中思想和情感表达的媒介,是为了向话语接受者表征自我进而达成价值共识的一种关系范畴。话语主体的“编码”过程与话语客体的“解码”过程共同构成了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交往过程。大众化阐释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获得群众基础的必要条件,当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概念判断、逻辑推论或理论体系表现自身时,其传播速度和辐射广度都是有很大局限的”^{[11]231}。这种局限产生的根源是:对于自身而言,“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化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作用机理本质上是情感认同”^{[12]715}。纯粹的政治说理不仅不符合意识形态的实践本质,也会因缺乏与感性情感的互通共鸣而有悖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机理,从而折损其运行效果。对于中国人民而言,生活世界的感性经验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出发点,远离生活方式的政治理论表述使得他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深入体悟与思考。可以看出,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表述无法跳出权威严肃的政治术语,无法获得社会民众的情感认同,其与大众化阐释之间存在的矛盾张力就会凸显出来,而这一矛盾张力只能通过加强意识形态话语建设来进行合理调节。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效平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性表述与意识形态大众化阐释之间辩证统一的矛盾张力也成就了话语体系发展的原因之一。

(三) 破解西方话语霸权与中国方案的世界性表达之间的矛盾张力

在西方语境中,“话语”既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手段,也是一种掌握世界的工具,它是西方意识形态、政治理念、思想理论及发展模式的总体反映,蕴含着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价值渗透性。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依托商品、资本带来经济发展优势,打着“和平演变”的旗号,在世界各地建构话语霸权,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传播西方文化,兜售“普世价值”,

使得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以绝对之势压制东方话语居于全球主导地位,“苏东剧变”“颜色革命”等重大历史变革更加促使“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由于意识形态话语权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集中表达,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因而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对于增强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意义重大。21世纪以来,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也得到显著提升,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是由于中国的崛起跳脱了西方原有的“西强东弱”的既定框架,导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质疑、震惊甚至恐惧情绪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的权威挑战,由此引发对中国模式的偏见性认知甚至歪曲解读。他们将中国模式定义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等,并接连制造“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搭便车论”“新殖民主义论”等歪曲论调,并不断炒作崛起后的中国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重蹈拉美国家覆辙;抑或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向美国权威发起挑战。与此同时,为维护西方的话语霸权地位,西方国家极力加强“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西方价值观念对华的传播与渗透,通过意识形态“无用论”“过时论”“趋同论”等各色声调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渗透与攻击。一时间,以精心炮制的政治陷阱矮化中国形象、抹黑中国声誉,成为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崛起、打压中国话语权的“软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13]11},中国的崛起成为新时代世界格局演变中的最大“变量”,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也自然担负起向世界阐释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使命,努力建构“世界性”的话语表达,将中国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表述清楚,将东方大国的责任担当展示明白,让世界真正听到中国声音、听懂中国声音。但从当前形势来看,中国的国际话语表达依然受到西方话语霸权的压制和诋毁,面对西方对中国崛起的误读,我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世界性表达依然不够充分,在这种不充分与西方话语霸权的相互作用之间生成的矛盾张力,汇集成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发展的外在动力。随之,破解这一矛盾外力即成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讲,就是通过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世界性意义阐述,有效化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在国际上存在的“失语”现象,对于西方现有的偏见误解予以批驳回应,让“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真正为世界所了解,让“中国立场”“中国情怀”真正为世界所倾听。

三、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着力点

时代变迁为中国意识形态话语嬗变提供了现实场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也进一步呼唤着对马克思

主义核心阐释的相应变革,而变革的基本逻辑就是要有效破解固有话语体系与时代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张力,形成依托于中国道路实践、展现世界格局的群众理论话语。因此,如何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成为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话语体系建设要更好地为意识形态本身服务,中国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系列成果作为理论支撑,呈现出科学客观的学理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作为现实支撑,凸显出广泛生动的实践性;以关注人类共识作为价值支撑,展现出兼容并蓄的世界性。由此决定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必须跳脱单一的政治话语,实现与学术性话语的渗透融合;跳脱僵化的理论话语,实现向实践性话语的基本转向;跳脱单纯的中国话语,实现与世界性话语的映衬衔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牢牢把握“话语形式变革”始终为“意识形态内容”服务这一不变的宗旨,牢牢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目的性和规律性相统一。

(一) 丰富政治话语的学术性表达,增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学理性支撑

在新时代的中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都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指向,构成治国理政之具体方针和策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特质,其表述方式是一套规范的政治话语体系。而政治话语的生命力从来不应由统治阶级在外部施加,而应生成于话语本身,生成于如何将政理的逻辑用学理讲清楚,将抽象的上层政治转换为彻底的群众理论说服人,即突出“用学术讲政治”。但是在当下,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绝大多数学术话语都是由政治话语进行引领,许多重大的意识形态话题观点也是由政治家们首先提出,随后进入学术领域,而学术界的研究却通常集中于对政治观点进行重复性的注解、诠释,忽略了对政治话语中理论底蕴的深层次挖掘,止步于建构政治话语的学术化向度,使得二者未能实现有机融合与贯通。由于缺少深厚的理论学术支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政治话语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也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折损。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实践探索与创新研究,所要达成的一个预期目标就是丰富意识形态政治话语的学术性表达,实现由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建设转向。通过建立一种良性的互动转换机制,构筑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在强大的学理支撑,实现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融会贯通。使政治话语不只停留于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阐释和强势灌输,还应以“讲道理”“摆事实”的姿态,通过扎实的学术分析,把政理的逻辑用学理讲清楚,用科学严谨的学术理论转换政治理念的言说方式,充分凸显政治话语深厚的学理内蕴,再以彻底的理论说服群众、掌握群众,也有能力接受群众检验、实践检验,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承载与践行锻造出可靠的主体力量。可以看出,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政治话语的学术化表达,实现社会意识形态整合从显性牵引向隐形助推的柔性过渡,学术话语产生于

人文社科学者基于社会实践、大众行为的一种理性诠释,通过对主流价值思想的传递,以一种柔性间接的方式化解意识形态政治话语表达的刚性特质,能更有效地起到引领价值共识、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

“如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只有政治权力的保障而没有理论‘权威’,则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甚至会让民众产生排斥和逆反心理;如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只有理论‘权威’而没有政治权力的保障,则容易产生意识形态的‘话语空转’,意识形态控制力和渗透力就会显得苍白无力。”^[14]新时代,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政治话语的学术性范式表达,实质上是促进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的良性统一,这就要求在“用学术讲政治”的过程中,一是要将政治话语所彰显的政治立场作为学术话语建构的价值遵循,使学术话语更好地为政治话语服务。任何学术话语的转换都不能跳脱特定时代下政治话语的“阶级背景”,要坚决避免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转换过程中发生“脱轨”,防止政治话语陷入错误学术话语的“政策默读”“理论误读”和“思想歪读”。二是在坚持政治共识的前提下,要尊重并包容学术话语的差异性。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术话语突出理论思辨,强调严谨缜密,在保持相同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尊重学者们的个体差异性,将和而不同作为学术话语兼收并蓄的生长点,全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

(二) 实现理论话语的实践性转向,体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时代性特征

马克思曾经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意识形态是基于人类的实践交往而建立起来的思想价值体系,它生成于社会实践,也以服务实践、指导实践作为根本的落脚点。可以说“意识形态的全部内涵和秘密都深藏于它的意向性对象——社会存在,即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中”^[15]。意识形态话语也只有回归生活本身,在解决人类现实问题的向度中才能昭示出自身的价值诉求与庄严使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无疑是具有内在深刻理论逻辑的完整体系,但是问题的根本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面临的现实跳闸,并非是满足理论自身的自足,其主旨是要指导、服务实践,最终要落实、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之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顺利而健康地进行,如此,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话语的实践性转向就成为加强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需要着力完成的重要突破。

中国意识形态理论话语的实践性转向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就是实现由“理论武器”向“物质力量”的变迁,即要求意识形态话语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断提升对社会实践的阐释力与引导力,尤其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提供话语证成。首先,意识形态的实践话语要与时代同频共振,实现“核心话语”与“时代话语”相互渗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话语,不同时代彰显不同时代的主题,人类实践的与时俱进总是依托于时代主题的发展变迁,因而实践话语的集中阐释也必然不可跳脱时代舞台这一背景环

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的时代条件、国际形势、社会主要矛盾都发生了深层次的历史变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阐述也应立足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从基本内涵、历史方位和科学方法三个维度深刻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时代任务与发展布局等基本问题。将“时代话语”作为意识形态“核心话语”的生长点,让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发展和未来走向,才会进一步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格局及价值旨归。其次,意识形态的实践话语要以事实说理,实现“经典话语”与“朴实话语”的相互映衬。通过挖掘新时代昭示新发展的“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魅力与张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与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包容与开放,以“中国奇迹”的经典话语和“中国故事”的朴实话语相互映衬,共同筑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说理根基,引导人民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最后,意识形态的实践话语要为人民代言,实现“集体话语”与“个体话语”的相互衔接。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1]可以看出,实现“理论话语”向“实践话语”转向之关键就在于“理论如何掌握群众”,即如何将理论内化为群众实践的根本动力,推动群众向自为阶级不断转化。而一种理论之所以能够被人民所认同并接受,不只在理论本身是否自洽,更在于理论内容是否契合人民的愿望要求,理论表达是否贴近生活实际、易于理解。故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要以人民最广泛生动的社会实践作为生成场域,找准人民利益诉求的契合点,加强对公平正义、民生福祉等民众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的研究表述,注重将理论传播与实践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群众的价值诉求相结合。在坚持人民立场的前提下实现“集体话语”向“个体话语”的过渡衔接,使“大道理”在“小叙事”中更加深入人心,凸显意识形态实践话语的包容性与亲和力。

(三) 诠释中国话语的世界性意义,彰显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人类文明性旨归

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是在新时代立足于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实践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从思想、理论高度予以创造性的回答、回应,即是为了说好“中国故事”、梳理与总结“中国经验”、彰显“中国模式”、体现“中国立场”“中国主张”与“中国智慧”。这也是中华民族为世界作出的卓越贡献,对当代人类文明无疑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由此,丰富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世界性表达,将本就蕴含在“中国方案”中的“世界性意义”进行强调阐述,将中国声音传递给国际同胞,充分彰显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人民性与包容性,使之成为可以与世界各文明体系进行深度对话的思想和理论。

面对当下“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为有力回应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模式偏见性的歪曲解读,以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中世界性意义的彰显有效化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在国际上存在的“失语”现象。首先,需要中国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具有广泛的人类共识。与西方依靠“霸权-依附”式的话语表达截然不同,中国所倡导的富强是依靠汗水和智慧的“和平崛起”,中国所坚持的发展是“和谐共生”与“合作共赢”,中国所提倡的文明是“兼容并蓄”与“和而不同”,中国所寻求的全球治理是“多边参与”与“协商共治”。从G20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到“一带一路”倡议,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中国始终秉承大国担当、肩负人类情怀为世界的发展进步出谋献策。中国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也应充分体现“中国立场”,既立足于中国人民的利益诉求,也要观照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让彰显全人类价值共识的“中国方案”逐渐成为世界发展的蓝图方案,实现中国与世界在责任、价值、利益等方面的高度融通。其次,需要中国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世界性话语建构中彰显中国特色主要是面向世界传递好中国声音,讲述好中国故事,提高“向世界阐释中国”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阐述清楚在中国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背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所蕴含的重要价值和独特优势,并且通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立足于中国道路之自信,生长于对时代课题之解答,根植于对人民诉求之回应,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对外理念之本土化表达。最后,需要中国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具有重大的价值超越。尊重不同国家与民族的现实差异,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世界沟通交流的重要前提。这就需要我们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促进中西话语的融会贯通,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借鉴西方有益的文明成果,寻找贴合国外受众的语言思维习惯,以双方的利益交汇作为话语共通的切入点,阐释中国,理解世界,以“外来话语”和“民族话语”的相互融通展现出超越种族国家的共同价值论与关注全人类利益的整体全局观。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列宁全集(第15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8] 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9] [美] 罗伯特·达尔. 现代政治分析[M]. 王沪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10] 列宁全集(第36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11] 刘少杰.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M]. 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2.
- [12] 侯惠勤.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1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01).

[14]杨荣刚 俞良早.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术话语建设的学理、困境与建构[J]. 思想教育研究 2018(4).

[15]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修订版)[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颜佳华

Study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Ideological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New Era

XU Qin - fa ZHANG Xiao

(College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China)

Abstract: Owing to the intrinsic need to manifest the value function of Marxist ideology in the new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system implies the historical transcendence and developmental construction of the actual form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paradigm.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ideological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new era should firstly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unification of its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Secondly, it should answer why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ideological discourse is necessary and possible. Thirdly, it should explore the motivation and endogenous mechanism tha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constantly enrich the academic expression of Marxist ideological political discourse, promote the practical turn of theoretical discourse and demonstrate the worldwide significance of China's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t ideology.

Keywords: Marxism; mainstream ideology;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上接第 133 面)

Inheritance of Ancient Classic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rewriting of the Tang story *Matrimony Inn*

GU Wen - bin ZHANG Xiao - xu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rewriting of Tang story *Matrimony Inn* by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In terms of inheritance, it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writers' perfunctory evolution of the storyline, mecha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pre-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transplantation of the view that "marriage is destiny". As for transformation, it is manifested in innovating the theme of the story, developing and renovating the plot and highlighti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changes in *Matrimony Inn* under the pe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riters are related to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and to the aesthetic psychology of the recipients as well. This literary phenomenon reveals that there is a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classics and modern works, and classics provide a fertile creative soil for modern works, while modern writings also expand classics in ingestion and integration. This prompts us to think further about how to exert greater artistic effect between classics and modern works, open up a broader narrative space, and create more profound literary classics.

Keywords: *Matrimony Inn*; rewriting; inheritance; innovation